

论魏源“春秋公羊学”及其 对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

申屠炉明

内容提要 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一书今虽不见,然从《序目》可知,它是魏源在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驱使下,承继刘逢禄发明何休公羊春秋义例说,进而突出张扬三世说的重要成果。被刘逢禄所揭橥的何休“三世说”主要是详今略古的“笔法”义例,其政治意图在“大一统”;被魏源所阐发的董子“三世说”,其哲学基础上是“气运”论,政治意图是更化改制。魏源还有一奇妙的发现:将鼓吹心性学说的孟子视为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思想的学术传人。这些成果引导康有为直奔西汉董仲舒,创立具有进化意义的三世说,掀起了托古改制的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运动)。由此可知:魏源上承刘逢禄,下启清末的康有为,是近代经今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 今文经学 春秋公羊学 董子春秋 三世说

申屠炉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210093

道咸以来,人们往往将龚自珍、魏源并称。龚自珍在他的诗中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然龚氏所开的风气,对当时及后来的思想界和文坛影响甚大。说到开晚清学术界新风气的大师当推魏源。昔日齐思和先生曾谓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史学则重本朝掌故,地理则重边疆舆地,而经学则提倡今文,前二者皆自魏源倡之。今文之学虽非倡自魏氏,而魏氏亦为一重要倡导人物^[1]。洵为知言。然检索 CNKI 系列数据库,从 1989 年至今全国中文期刊论魏源者虽 330 余篇,但真正论魏源与今文经学关系者,仅十数篇而已;而这十数篇,又限于分析其《诗古微》、《书古微》的内容,而对于魏氏研究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贡献,尚无

论文论及。在近期出版的著作中,情况也多如此^[2]。究其原因,莫非有二:其一,魏氏《董子春秋发微》一书今不可见,仅仅有其《序目》可析;其二,这一序目并未引起梁启超的注意,他当年在作《清代学术概论》时,只提及魏源的《诗古微》和《书古微》。但是,如果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审视魏氏的春秋学思想,便可发现:在万木草堂,康有为专讲《春秋董氏学》,可能是直接来自魏源,而要认识《董子春秋发微》之价值,首先简述一下魏源的学术宗旨,即是十分必要的。

一、魏源的治学宗旨和趋向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嘉庆十八年举明经,

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项目编号 08LSB005)的阶段性成果

明年入都,从胡墨庄问汉儒家法,从姚敬塘问宋儒之学,学《公羊》于刘逢禄。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其编《皇朝经世文编》,于是留心经济之学。二十五年成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权扬州府东台县事。后又权扬州府兴化县事。咸丰元年,特授高邮州知州,不久辞归。七年卒于杭州僧舍,年六十四^[3]。魏源一生,著述繁富。经学方面著名者有《诗古微》、《书古微》,好求微言大义。史学方面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皆经世之作。其余有《古微堂四书》、《老子本义》、《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佚失者多种,如《公羊古微》、《春秋繁露注》等。

魏源生当叔季衰世,对乾嘉以来的汉学考据深为不满,在《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中说:

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钗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为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4]

这里,魏源借为李兆洛作《传》,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细为分析,有这样几层意思。自乾隆中叶以来,人所敬仰的汉学大师,如苏州一门祖孙父子三代传经的惠氏、江声,常州臧庸、孙星衍,嘉定钱大昕,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徽州戴震、程瑶田等人,他们的经学研究路子越走越窄。反而视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及浙东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研究为史学而非经学,或指为宋学而非汉学。按,魏源此论显然是针对当时汉学门户森严的情况而发。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称儒家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清代,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云云。故书中首列阎若璩、胡渭等,而将黄宗羲、顾炎武摈之书外。客有不解者,质疑说:“有明一代,固有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梨洲起而振其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所以阎百诗、胡肫明诸君子皆推挹南雷、昆山,今子不为传,岂非数典而忘祖歟?”主人回答说:“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

言,岂真知灼见者哉。”^[5]殊不知清初诸老气象博大,治学的目的本为经世致用。顾炎武自称其《日知录》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6],又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系经世之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莫不如此。浙东本是王阳明的故乡,素以讲心学著称,然自黄宗熹以下更以史学作为经世之具。在魏源看来,这些才是有用之学。相反,乾嘉汉学大师的“训诂音声”之学是“锢天下聪明知慧”的无用之学^[7]。

魏源心目中汉代的经学与治术合一,这才是真正的经学,也是有用之学。魏源说:“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8]这里,魏源将“治”、“经”、“师儒”三者作了界定,也就是魏源在同篇文中说的治经之儒、明道之儒和政事之儒。成均、辟雍是周代学校的名称,这里泛指学校,师氏、保氏、大乐正等是学校里的教师。人才就从这里培养,由小学进入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称为士。士之九年能通经者,国家就免除他的徭役,让他专心治经,所以,汉代的儒生就能够通经致用。

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9]

而清代乾嘉以来的汉学经师却是:

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物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10]

魏源感叹这些经师们还“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堪为国家人民忧虑。所以魏源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中批评当时学界风尚,必说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许、郑之学综六经。他认为许、郑二人,惟六书、《三礼》学较诸经为闳深,正是因为多用今文家法之故。主张“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在魏源看来,治学次第先由诂训、声音即前说的许郑之学进于东京典章制度;再由东汉之学进于西汉的微言大义。两个层次中,西汉之学合经术、故事、文章于一途,显然要胜于东汉之学。正如孔子所说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魏源本人的治学趣向以及治学立场于此可见。这样,以刘逢禄对何休公羊学的研究为中介,深入研究董仲舒的春

秋学便是必然的治学之路了。其后的历史证明,这一转变直接带动了晚清改良思潮的兴起,对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魏源的“春秋公羊学”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称其父“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则魏源的《春秋》学得之于刘逢禄。先看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

刘氏《春秋》学最有名的著作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简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以及《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他自述撰作缘起云:

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节符,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1]

在刘逢禄看来,五经中《诗》有《毛氏传》,《礼》有《郑氏笺》,《易》有虞氏义,都有条例可说。作为五经“管籥”的《春秋》,惟有《公羊传》有义例可寻,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作《释例》。刘逢禄虽然强调从小就喜欢钻研董、何之书,但其书确切地说却是给何休的《解诂》作的释例。众所周知,汉兴以后,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董仲舒尤为著名。东汉末年的何休是汉代为公羊学作总结的人,而何氏《解诂》却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可见阐发的是胡毋生之说。刘逢禄对于《春秋公羊》的贡献在于通过寻求何氏条例,讲明何氏义例。使沉湮不明的公羊师说,揭示于千载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氏的《释例》于《公羊传》厥功甚伟。

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的体例是:先标举经传文字,即将原本散见于经传及何氏的《解诂》的内容,分别纳入相关的“例”中。刘氏自己的见解则以“释曰”的形式,表而出之,附于每篇之末^[12]。

魏源作为刘氏高门弟子,首先继承了刘氏的学说,这是没有疑义的,但魏源并未止于东汉的何休,而是在刘逢禄研究何休成果的基础上,进而直探《春秋公羊》的本源,上推到西汉的董仲舒那里。魏源认为,西汉诸儒中“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董生即董仲舒,为《春秋》学大师。为此特作《董子春秋发微》七卷,《序》云:

何为而作也?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义,而补胡毋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13]

魏源不满意东汉的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时仅依胡毋生的《条例》,而于董氏无一言及。此前曲阜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武进刘逢禄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虽都以精研《公羊》闻名于世。但他们的著作也仅为何氏拾遗补缺,于董氏之书无多涉及。魏源欲直接追溯董仲舒的学说,发挥《公羊》的微言大义,补胡、何之未备。在魏源眼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不列经文,表面上看似不及何氏章句分明,其实书内“三科九旨”等义,粲然大备。而且“闳通精深,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毋生、何邵公《章句》之上”。这就是魏源为什么要特别表彰董仲舒的原因。

魏源认为,后人把董仲舒的书以《繁露》作为全书的书名,且妄移《楚庄王》一章于全书之首,是“矫诬过甚”,未必尽当。魏源要恢复董书之旧,书名应称为《董子春秋》。又以《繁露》一篇兼撮三科九旨,为全书之冠冕,故此篇应置于《董子春秋》的第一篇。《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是穷天人之绝学,视胡毋生《条例》有大巫小巫之叹,故此篇为全书的总纲。魏源把通行本《春秋繁露》作了一番改编,取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总结出来的“例”附于各篇之后。《董子春秋发微》一书,今虽不可见,但我们从《序目》中略知其梗概。全书篇目如下:

《繁露》第一。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异内外例。

《俞序》第二。张三世例。《奉本》第三。张三世例。

《三代改制质文》第四。《爵国》第五。《符瑞》第六。以上通三统例。

《仁义》第七。异内外例,附公始终例。《王道》第八。论正本谨微兼讥贬例。

《顺命》第九。爵氏字例(尊尊贤贤)。《观德》第十。爵氏字例(尊尊亲亲)。

《玉杯》第十一。《玉英》第十二。《精华》第十三。以上予夺轻重例。

《竹林》第十四。兵事例(战伐侵灭入围取邑表)。

《灭国》十五。邦交例(朝聘会盟表)。《随本消息》第十六。邦交例(同上)。

《度制》第十七。礼制例(讥失礼)。《郊义》第十八。礼制例(同上)。

《二端》第十九。《天地阴阳》第二十。《五行相胜》第二十一。以上灾异例。

《阳尊阴卑》第二十二。通论阴阳。

《会要》第二十三。《正贯》第二十四。《十指》第二十五。以上通论《春秋》。

在魏源的改编本中,将《繁露》列于首篇,理由上面已述。此篇中的“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异内外例”,则来自刘逢禄的总结。以下皆同。从上面这份《序目》中,我们不难发现通过魏源的这么一番改编“发微”后,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在沉晦千载之后,大义炳然,昭然若揭。

我们还可注意的是,魏源的《春秋公羊》学著作虽不得其详,但在其他地方却运用了《公羊》中的“三世”说。在《老子本义》、《论老子》等文中再三说老子的道是太古道,书是太古书。有黄老之学,宗无为,出于上古,即太古。老氏之学,传之列御寇、杨朱、庄周,为虚无之学,为为我之学,为放旷之学。列子虚无,释氏近之。杨子为我,宗无为;庄子放荡,宗自然。时代不同,学术随之而变。魏源将之比拟人的一一生中的三个阶段。

今夫赤子哺乳时,知识未开,呵禁无用,此太古之无为也。逮长,天真未漓,则无宝以嗜欲,无芽其机智,此中古之无为也。及有过而渐喻之,感悟之,无迫束以决裂,此末世之无为也。^[14]

或问:刘逢禄发明何氏公羊三世说,魏源发明董子春秋之三世说,两者的意义会有不同吗?当然仅从三世说本身而言,并无太多的差异,魏源的“太古”、“中古”、“末世”三世,显然是据《春秋公羊》学说加以发挥而成。“太古”、“中古”、“末世”三世既类似于《春秋公羊解诂》中的“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又相当于太平、升平、乱世之意。但我们如果联系何休与董仲舒、刘逢禄与魏源四人的思想体系来看,刘、魏两人所发明的三世说,其差异便显现出来。何休生在东汉末年,皇权没落,地方豪强的势力渐起,因而述作之意为强调“大一统”^[15]。而董仲舒在西汉由黄老无为之治向儒家有为之治的大转折时期,他强调的是尊王改制,经世及改良社会的意图十分明显,就何休而言,所谓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主要是个详今略古的“笔法”问题,这一问题在刘逢禄那里固然有所弱化,然而到了魏源这里,其太古或今世的问题与气运说联系起来,显然是直接表明三世是社会本身发展的态势。他在《老子本义·论老子》中说:“气化逮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不能不后世。”^[16]若将其思想作进一步的引申,就是一种历史进化论了,这就是后来康有为所做的工作。而魏源当时认为,社会是一乱一治循环往复的,乱世之后

必要回到太平之世。他举例说,古代天下大治始于黄帝,成于尧,这是太古的太平世,夏商周三代是升平的中古世。秦是乱世。汉朝气运再造,民脱水火,则又回到太平世界了。

魏源还有一奇妙的发现,即他讲《春秋》学,不仅把重点移向了西汉的董仲舒,——这比起他的老师刘逢禄重东汉的何休,已是往上推了一大步,他还把孟子看作春秋学的传人。魏氏《董子春秋发微》虽未明言,但在《古微堂集》其他地方却有明确的表述。如魏源在谈到孔子的微言及传人时说:

性与天道,皆寄于假年学《易》,得闻者惟颜子一人。……孟子一生,惟以上继《春秋》自任,旁引《诗》、《书》,而无一言及于《易》,亦无一言及于天道,此其精微之同异。^[17]

孔子有关“性与天道”方面的精微之言,只寄托在阐述《易》的言论中。《论语》中有假我数年以学《易》的感叹。孔门弟子中颜渊得之,其他高才生还不了解此微言。这层意思,常州学派的宋翔凤已“发微”^[18],魏源显然是有所承。魏源则进而又点出孟子传孔子《春秋》微言,这当然也有根据。《孟子·滕文公下》有一段著名的话: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魏源在讲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微言的时候,没有讲这其中与三世说有何关系,但当他的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被康有为视为古代民主学说之后,它便成为三世说的理论“资料”。如果说《董子春秋发微》强调的是三世进化的意义的话,而受魏源启发而发挥孟子言春秋大义时,则着重讲三世间不可“躐级”。必须进化也好,不可躐级也罢,无不证明一点,魏源作为刘逢禄到康有为的中介环节,其实际的意义是将学术研究的今文经学,转变为社会改良的理论和学术工具,在此问题上,魏源起了关节点的作用。请见下节分析。

三、魏源的《春秋》学下启康有为

康有为的《春秋》学著作早期有《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考》等;1903年之后,有《孟子微》、《礼运注》出版。《春秋董氏学》八卷,是康有为阐发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专著。虽然康有为本人在本书中没有提及受过魏源的影响^[19],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证

明,其书远绍刘逢禄,近承魏源之说而来。

早在常州学派的先驱庄存与时代,提倡《春秋公羊》已是空谷足音。至刘逢禄时已开始专精于何氏的《春秋公羊解诂》,魏源则直接追溯到西汉的董仲舒,已如前述。这中间有一个逐步往上推移的过程。凡此种种,想必康有为已是全盘接受。否则不会截断众流,直奔主题到董仲舒那里了。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自序》中说,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则统一于《春秋》。孟子祖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及其他书,却独尊《春秋》。《春秋》有三《传》,《左传》详文与事,与孔子之道无与,惟《公羊》独详《春秋》之义。同为今文的《谷梁传》不明王义,虽也传孔子之道,却没有发扬光大。只有《公羊传》详素王改制之义,故传《春秋》之义的是《公羊传》。按《公羊》得《春秋》之义,而《左传》不传《春秋》,这些是汉代今文博士攻击《左传》的老话题。刘逢禄也说过《春秋》是“六经之管籥”。康有为这些观点显然都是承前人而来。清代治《春秋公羊》的如刘逢禄等所主的多是何氏《公羊解诂》,前举魏源已注意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作《董子春秋发微》,至康有为明确提出“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的论题。康有为说:

虽然公羊家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说,辄疑异之,吾昔亦疑怪之。及读《繁露》,则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周为三统,如探家人筐篋,日道不休。……吾以董子学推之今学家说而莫不同;以董子说推之周、秦之书而无不同。^[20]

康有为将《春秋》的地位抬得很高,认为《春秋》为“群儒宗”。1896年在万木草堂给学生讲课时说:“六经以《春秋》为至贵。”“孔子制度在《春秋》,义理亦在《春秋》。”甚至还讲六经中除了《易》、《春秋》,其余的即使没有了也不要紧的话。康有为又认为,要通《春秋》必由董氏《繁露》为津逮。他说:“《春秋》之意,全在口说。口说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21]甚至到了“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的地步^[22]。魏源虽强调董氏《春秋繁露》的重要性,那也是从探求《公羊》义理的角度立论。康有为则明确上升到一个绝对的地步,没有董生就不能窥孔子之道。细味之,一点也不奇怪,盖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是学以致用的人物,康氏甚欲效法之^[23],故于文中三致意焉。

且看康有为对“三世”的阐发,以见其《春秋董氏学》之一斑。康氏先举《繁露·楚庄王》:“《春秋》分为

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说: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24]

三世说是《公羊》的大义,自无可疑,但康有为为之列为《春秋》第一大义,而且是孔子的非常大义。由此创造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又与《礼运》结合,创造出小康、大同世界,则是康有为的发明,说详下。康有为将《公羊》中的“三世”说,引申发挥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

康有为又认为《春秋》三世之义是孔子之道,可惜过于艰深,不得窥其藩篱。及读《礼运》,豁然开通,乃浩然而叹:“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25]进而感叹《礼运》一篇是“孔氏之微言真传”,是“万国无上之宝典”。这样将《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与《公羊》中的“三世说”结合,创造出新的大同说,将传统的《公羊》学发挥到了极致。

康有为对他的几部著作极为自负和自信,1901年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中称:“天未丧斯文,庸予小子,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孔子将原来的鲁《春秋》笔削加工成今天的《春秋》,中间的奥妙无人得晓,这个秘密在二千多年后终于被他神悟出来,这是何等的豪迈语。

如果将康有为从《春秋董氏学》与魏源《董子春秋发微》的联系分析康有为的新三世说,除了进化思想外,还有两点思想注意。其一,康有为直接将三世说与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相联系。康氏认为,三世说不能再放在学术的殿堂中被时光继续封尘下去,它必须进入社会改革的进程。其二,他看到了孟子为春秋传人的作用,于是认定孟子传大同、荀子传小康,从而引发了对荀学特别是刘歆新学的批判。而这场批判的意义恰恰在于将三世说与民主改良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故而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孟子微》、《礼运注》等文中,将三世说与现代民主学说乃至民主政体挂起钩来:

孔子作《春秋》也,立三世义。每一世中又有

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为九世,重之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皆视其时而行之。曰据乱世,专制政体也;曰升平世,立宪政体也;曰太平世,共和政体也。至太平时,则内外大小如一。……无君并无大统领,众人共举,太平之至也。^[26]

当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革命思潮开始酝酿,连梁启超也有鼓吹“破坏主义”之时,康有为变更了三世说强调的重点。他在 1903 年出版的《孟子微》中说:

《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孟子传《春秋公羊学》,故有平世乱世之义,又能知平世乱世之道各异。然圣贤处之各因其时,各有其宜,实无可如何。盖乱世各亲其亲,各私其国,只同闭关自守。平世四海兄弟,万物同体,故宜饥溺为怀。大概乱世主于别,平世主于同;乱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乱世近于塞,平世近于通,此其大别也。……若孔子生当平世,文明大进,民智日开,则不必立纲纪限名分,必令人人平等独立,人人有权自主,人人饥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别,而用通同公三者,所谓易地则皆然,故曰“礼时为大”。^[27]

由此我们发现康有为的《春秋》研究,在汉代诸儒中突出董仲舒的重要性,故有《春秋董氏学》。董氏之前则突出孟子能传孔子《春秋》之义,故有《孟子微》。此外在《礼运注》、《论语注》等中与《春秋公羊》作了沟通,文繁不赘述。由此创造出具有康氏特色的《春秋》学理论。

综上所述,魏源《春秋公羊》的学研究,上承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下启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是清代的《春秋》著述中别开生面的著作,其思想价值远过文献本身的研究价值。

注释

[1]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中国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30 页。

[2]如陈其泰与刘兰肖合著的《魏源评传》中,亦未言及魏、董学术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948 页。

[4]《魏源集》第 358-359 页。

[5]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6]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7]魏源对乾嘉朴学诸儒不满,于戴震、段玉裁师弟尤甚。在《说文假借释例》中谓转注之说,戴、段全非。至于假借之说,段君

言之虽深悉其本原,而未旁通曲譬其族类云云。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近世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勘,而其徒金坛段氏反复力辩为赵之勘戴。魏源举证为戴勘赵。最后甚至对戴之学术人品提出质疑。魏源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有同门方晞所作《群经补义序》称曰同门戴震可证。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则攘他氏之书,犹其事之小者也。”《魏源集》,第 236 页。

[8][9][10]《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 23-24 页,第 24 页,第 24 页。

[11]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叙》,《清经解》卷一二八〇,上海书店影印 1988 年版。

[12]刻入文集的“释三科例”是《公羊何氏释例》中的“释曰”部分,文辞稍异于《释例》。又《释例》第十一篇《王鲁例》入于文集的“释三科例”中篇中。

[13]《魏源集》上册,第 134-135 页。

[14]《魏源全集》第 2 册,〔长沙〕湖南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647 页。

[15]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6]《魏源全集》第 2 册,第 647 页。

[17]魏源《论语孟子类编序》,《魏源集》,第 146 页。

[18]详见拙作《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一文,《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2009 年第 3 期。

[19]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自序》提到近人江都凌曙的《春秋繁露注》,不过说他是“缘文疏义,如野人之入册府,聋者之听钧天,徒骇玮丽,不能赞一辞”云云,看来也不甚许可。又《南海师承记》提到学《春秋》当从何人?举近人陈立《公羊义疏》,间有伪经,而征引繁博,可看。刘氏逢禄、凌曙说《公羊》诸书可看。《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441 页。

[20]《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 629 页。

[21]《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 295 页。

[22]另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春秋繁露》说《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在《公羊》、《谷梁》中也无,而《春秋繁露》却独有之。又云:“董子微言大义,过于孟、荀。”(第 387 页)“孔子微言大义,至董子始敢发挥,汉朝孔学已一统,人皆知尊孔子也。”(第 388 页)。

[23]康有为在 1895 年 5 月《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引《易》“穷则变,变则通”后,又引董仲舒的名言:“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云云,提出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即是一例。《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 85 页。

[24]《春秋董氏学》卷二,《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 671 页。

[25]《礼运注叙》,《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53 页。

[26]陆乃翔、陆敦騷等《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一章,《康有为全集》第 12 册第 458 页,附录二。

[27]康有为《孟子微》卷一,《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421-422 页。

〔责任编辑:肖波〕